

研究論文

## 經驗表述與理論探尋—— 民族傳播研究的可能性路徑

孫信茹、楊星星

### 摘要

文章基於民族誌和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對少數民族鄉村社會與大眾傳媒的互動進行研究。其中，重點分析了「媒介化社會」的背景，大眾傳媒對鄉村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等帶來的影響。文章認為，在此研究領域中，應該將媒介還原到其存在及發揮影響作用的基本背景中，並注意在複雜的社會網絡運行和構成中，媒介力量也和社會生活、經濟運行、文化影響等其他邏輯一樣，同樣發揮着重要的影響作用。可以說，本文的研究是對民族傳播研究領域的一次新的理論探索。

關鍵詞：民族傳播、媒介在場、媒介邏輯、媒介意義

---

孫信茹，雲南大學人文學院新聞系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後。研究興趣：傳播與社會、傳播人類學。電郵：sunxinru1976@163.com

楊星星，雲南大學人文學院新聞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傳播學、傳播人類學。電郵：123xx456@163.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2年6月11日。論文接受日期：2014年1月13日。

---

Research Article

## **Expression of Experien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ory: The Possible Path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Research**

Xinru SUN, Xingxing YANG

---

###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of rural society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mass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ethnography and case studie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hat how mass media influences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structure of the rural society. This paper argues media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basic context in which it exists and 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process of the complex social networks, the power of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other powers, such as social life, economic operation and cultural influence. This paper is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research.

**Keywords:** ethnic communication, media presence, logic of media, significance of media

---

Xinru S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fellow).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thropology.

Xingxing 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anthropolog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Sun, X., & Yang, X. (2014). Expression of experien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ory: The possible path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0, 133–156.

## 鳴謝

文章為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大眾傳播與少數民族鄉村社會結構轉型的民族誌考察」(項目編號：13YJA860023)階段性成果。2013年雲南大學第四批中青年骨幹教師培養計劃階段性成果。

## 研究思路何以展開

### 傳媒與少數民族研究概述

在關於少數民族的相關研究中，既有從宏觀層面對少數民族文化傳承或其社會整體發展、變遷進行的闡釋和研究，也有在立足於微觀社區的基礎上，探析某個具體民族或某類專門性問題對社區帶來的影響和形成的衝擊。相較不同的研究進路，將少數民族文化和發展置於其生存的基本社會空間——村寨的研究較為普遍。這一方面是因為就我國目前的社會狀況而言，「村寨」有其獨特的社會、政治、經濟、宗教、習俗、教育等情境與特質，在這樣的微觀層面上展開研究比較容易把握迥異於國家「大傳統」的「小傳統」；另一方面，伴隨着社會急劇的變動，少數民族村寨並非獨立於大的國家和社會背景而存在，對它們的觀察，實則也是洞悉當今中國社區或地方文化變遷的一種重要途徑。該領域研究成果較為顯著：

一是從較宏觀的社會變遷及轉型的層面上來考察少數民族村寨文化。這些研究尤其關注從19世紀中葉開始，整個中國社會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構築過程之中，中國少數民族村寨文化的邊緣性如何進入全面加速和變化的階段。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少數民族村寨的變遷更是一場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的社會變革。二是從微觀層面分析，主要涉及到了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發展和轉型的問題、旅遊發展、教育、傳統習俗變遷等多個論題。如有學者(陳慶德，2004)關注少數民族村寨在其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它們在市場參與中所處的邊緣性地位的基本事實。有學者(羅永常，2006)將興趣轉向文化轉型和社會變遷過程中民族村寨旅遊開發的問題，認為民族村寨旅遊開發肩負着脫貧致富與民族傳統文化傳承的雙重使命。無疑，這些討論是頗有深度和價值的。

但是，不可否認，在人類學或是社會學的這些研究領域中，較少能看到專辟話題對大眾傳媒展開的討論，雖然也會有學者對傳媒在少數民族村寨社會、文化變遷中的影響略有涉及，但基本上更多像是信息的匯總和整理，至多也只是作為村落研究中一種基本性的背景出

現。相較之下，倒是一些從事傳播學和傳媒研究的學者試圖探究傳媒對少數民族文化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少數民族社區如何在社會變遷中尋求新的文化發展之路等問題。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該領域目前的研究現狀可以大致歸為以下幾類：

一是關注媒介影響下的鄉村社會發展與傳播的問題，此類研究多從宏觀層面分析。早在20世紀50、60年代，一些美國學者在發展傳播學的領域有所斬獲，代表性的研究如1958年勒納《傳統社會的消失：中東的現代化》，其中他特別強調了傳播形態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和傳媒對人的現代化的作用；1969年羅傑斯《農民的現代化：傳播的影響》，他發現媒介接觸頻度和農民的觀念現代化成正相關關係。就我國的情況來看，近年來傳播和鄉村社會發展也成為國內學者關注的領域。如雲南省省院省校合作項目傳播與民族發展「雲南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關係研究」（張宇丹，2000）、姚君喜（2005）《甘肅大眾傳播與社會發展報告》等，這些研究或者採用抽樣調查等質性研究的方式，或者站在較為宏觀的層面從媒介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力等問題展開調查和分析，其核心在於了解農村和民族地區媒介的發展現狀，進而探討大眾傳播如何促進人的觀念的現代化、如何改變當地文化等問題上。

二是關注現代傳媒對少數民族文化變遷的影響。此類研究聚焦於現代傳媒影響下的民族文化傳承方式的改變、不同文化之間相互交融滲透、民族文化新的發展變化等問題上。可以說，這類研究是目前傳媒與少數民族的相關研究中最為集中，成果也最為豐富的。如有學者（譚華，2007）關注現代傳媒如何通過傳播多樣的異質文化從而在村落中建構起一種多元的文化格局。有學者（張瑞倩，2009）發現大眾媒介在充當着少數民族社區中「文化修補」的工具，通過記錄和再現使得當地傳統文化得以存續。這些研究者大多採用了相似的研究路徑和調查方法，即將研究對象放置於特定的少數民族社區和微觀的社會生活中來進行考察，試圖探尋大眾傳媒與民族文化多元和複雜的文化互動、形象重構甚至社會轉型等問題。

三是關注現代傳媒與民族鄉村日常生活的互動。此類研究多從微觀的層面考察具體場域中民族社區和日常生活的變遷。相較之前的成

果來說，研究者自覺借用了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資源。在這種取向之下，該研究思路體現出對「媒介」和「傳播」重新的理解和闡釋。如美國學者詹姆斯·W·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裏，將「傳播」理解為一種「文化儀式」，從而展示出他和傳統媒介研究者迥異的理論視野和學術模式。國內學者郭建斌(2005)以中國西南的一個少數民族社區作為研究個案，借用布迪厄的「象徵資本」概念，追問「象徵資本」對鄉村社會關係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等問題。吳飛(2007)將傳播看作一個網狀模式，提出對一個社區「傳播網絡」的關注，有利於把握社區的運作機制。孫信茹(2011)以一個哈尼族村寨為例，試圖闡釋手機使用者生活語境的複雜性和差異性，使得手機媒體在村落中呈現出不同的社會活動及文化表現。應該說，該研究方向不論在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較鮮明的特徵。

當然，這些研究和專注於自身領域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者不同，這類學者力圖從傳播學和媒介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自覺運用人類學研究方法，尤其是田野調查和民族誌的研究方式對傳媒與少數民族之間的互動和關聯展開分析。這樣的研究思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觀察少數民族社會和文化變遷全新的視角。就其研究特點來看，這些研究大多以個案的方式呈現出來，很多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對不同少數民族田野資料的收集和考察之上。雖說不同的個案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借鑒的田野資料和一定的理論分析，但有時這樣的思路也會讓研究者產生進一步的思考，比如：此個案與彼個案之間的差異何在？我們能否在不同個案之間尋找到關聯，從而建立起關於少數民族文化或更具體而言少數民族村寨與傳媒研究的某種理論框架？是否可以在個案的基礎上在進行延伸性的研究和分析，從而獲得更多的理論思考和分析？

### 「媒介化社會」的研究語境

我們在觀察相關學者工作和研究者本人從事多年此類研究的基礎上，不妨可以思考這樣一些基本問題：我們在甚麼樣的語境之下展開研究？是否能夠建立一些基本的分析概念？這類研究如何更深入地展開？如何在該領域的探尋中形成傳媒研究者獨立的立場等。

由此，我們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應該建立怎樣的研究語境？

對於傳媒研究者來說，首先應該看到我們今天在做少數民族與傳媒研究時一個不容迴避的語境就是「媒介化社會」。儘管在一般意義上，我們說的少數民族村寨不論從其存在的地理區域，還是其社會發展狀況等方面，顯然都處於較為弱勢的狀態，但是儘管如此，它們也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到了媒介化社會的影響之中。從1998年開始，中國內地開始啟動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到2011年末，中國內地廣播、電視人口綜合覆蓋率分別達到97.06%和97.82%。廣播節目套數2,590套，有線電視用戶數達到20,264萬戶，數字電視用戶達到農村中央廣播電視節目無線覆蓋工程，使中央第一套廣播節目和中央第一套電視節目全國人口無線覆蓋率達到85%和85%，中央第七套電視節目全國人口無線覆蓋率達到69%，覆蓋人口分別為11億、11億、9億。<sup>1</sup>以筆者調查多年且少數民族較為集中的雲南來說，2011年，農村廣播覆蓋率到95.69%，電視覆蓋率為96.72%。<sup>2</sup>2012年7月19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佈第3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6月底，我國農村網民規模達到1.46億，其中60.4%的農村網民使用手機上網。<sup>3</sup>無論是從國家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來看，還是從筆者的一些田野調查點觀察所得，不難看到，在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的聚居區，村民們對現代傳媒的認知、使用和熟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並不亞於城市人。因此，「媒介化社會」是我們進行此類研究首先要面對的一個基本背景。

「媒介化社會」作為研究者對當今時代特徵的一個重要表述，無論是早年的傳播學者李普曼用「腦海圖景」對身處媒介影響之下的世界進行的描繪，還是如有的學者提到的人們對現實社會的感知越來越依憑於傳播媒介的論斷，都能看到，學者們顯然關注到了當今社會中媒介與社會兩者之間的關係及互動。由此，有學者提出「媒介化的社會」(socialization of the media)和「社會的媒介化」(mediation of the society) (黃成炬，2007：64)的概念。前者力圖說明當代社會中大眾傳播媒介作為特定社會組織的社會特徵越來越明顯；後者則指明當代社會中個人和公眾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正越來越緊密地與大眾傳媒聯繫起來並通過大眾傳播來實現(黃成炬，2007：64-65)。



簡言之，沒有大眾傳媒和傳播活動介入的社會生活已無法想像，對社會與傳媒關係的描述已然離不開「媒介化社會」的基本背景。由於傳媒和傳播活動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廣泛滲入，人們不僅對傳媒的依賴程度加深，而且很多社會事務的處理、群體或個體權利的爭取和發聲、文化資源的轉換與博弈等都必須要借助一定的傳媒，並輔之以相應的傳播活動才能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說，「媒介化社會」或許不算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分析概念，卻更如一個研究現代社會時就必然要面對的基本背景和分析語境。進一步說，「媒介化社會」的具體語境提醒人們，關注社會群體或個人的社會結構變動、經濟生活發展、文化差異及變遷等問題時應該把媒介及其傳播活動納入到考量的範疇之內。

可是，我們對於「媒介化社會」的語境還不能僅僅滿足於一種「背景性」存在的理解。媒介化社會之所以重要，還不僅指它作為一種「背景」的存在，其「表明的還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孫少晶，2011：3)。有國外研究者提出「媒介化是一個延伸(extension)、替代(substitution)、聚合(amalgamation)、接納(accommodation)的過程，(那麼)這個過程帶來的是傳播媒介和社會的變化」(孫少晶，2011：3)。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將少數民族社區存在的媒介化背景理解為媒介的進入、浸潤，也不能僅僅停留於媒介對其逐漸發揮出的若干影響，而應該看到媒介介入到當地社區之後，對當地人的生活、習俗、傳統乃至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整體性影響和社會結構性的轉變。

進而言之，這樣的視角也意味着在媒介化社會的背景下研究民族傳播時，我們要將傳統的民族文化和村寨生活研究納入到一種全新的「媒介邏輯」的思考框架當中。當然，這種「媒介邏輯」並不是一個新穎的概念，早在上世紀70年代，Altheide和Snow就對此有詳細的論述。作為最早探索媒介邏輯的學者，他們提出媒介邏輯是「確認媒介文化和新聞生產標準的一個重要窗口，也是描述和解讀社會發展變化的重要思考路徑」(孫少晶，2011：4)。這種「媒介邏輯」的採用，並不是承認媒介對事物和社會的影響是唯一因素，而是認為媒介是社會發展和變遷中很重要的一種要素。「一個社會活動體是生存在多種邏輯形式(包括社會生活邏輯、經濟邏輯等)運行的複雜網絡中。這多種邏輯力量互相影響，形成一個複雜的場域(field)。但是，不容否認的是，媒介邏



輯是一股日益凸顯的隱性力量，其滲透性、持久性、隱蔽性、複雜性甚至變異性，讓我們不能忽略它在現代社會發生的重要作用」（孫少晶，2011：5）。事實上，將社會視為一個複雜的整體性存在，在庫利的研究中早有體現。他認為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是由「形式或過程構成的複合體，其中每個形式或過程都在與其他形式或過程的互動過程中生存和成長。這些形式或過程一起結合為一個非常緊密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一個部分發生的變化將會對所有其他部分產生影響」（庫利，1999：21）。毫無疑問，媒介和傳播是社會整體性構成和社會變動中重要的組成要素和構成部分。對於傳媒與整個社會系統的互構，就連一些人類學家也坦言不諱，美國人類學家赫茲菲爾德（2005：324）提醒我們說，從人類學角度而言，大眾傳媒的重要性愈來愈不容置疑。他認為，傳媒在很大程度上是隨着日常經歷的發展而延續的，它們塑造了日常經歷，也反過來被日常經歷所闡釋。建立於這樣的研究語境和分析思路之下，為我們思考和展開傳媒與少數民族相關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空間和可能性的理論進路。

### 建立甚麼樣的分析概念

當我們確立了研究中的基本語境之後，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採用一系列與之相關的概念展開具體的研究和分析。這樣，和媒介化社會相關的概念首先表現為「媒介化」。何為「媒介化」？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中介性」。「中介」意味着一種事物與其他事物、一個人與他人要建立起某種關聯時就必須要借助的手段。如此來看，「任何事物都處於被中介的關係之中（everything is mediated）」（孫少晶，2011：3）。「中介性」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在於，如果媒介不具有這種中介的屬性，那麼媒介化的過程便不可能完成。「媒介化不是一個常規意義上的簡單過程，它更是一個元過程（meta-process），可以作為描述和解釋經濟、社會、文化維度以及實際變化的基石。」（孫少晶，2011：6）

我們認為，「中介化」的概念並非簡單強調媒介在人與社會關係中的「介質」、「中介」的「橋梁」作用，而是突出媒介和傳播在社會各個層面和結構中所「引發」的關係的變動。如果從這樣的層面上看，「中介

化」的概念不只是具體傳播活動中微觀的從「一方」到達「另一方」的過程，而是立足於媒介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發生的關聯和互動的分析。因此，在這個基點上展開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值得我們去借鑒。無論是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還是波茲曼去思考「技術壟斷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於技藝和技術的統治」(波茲曼，2007：52)；也或是賽倫·麥克萊看到的：「傳媒充斥在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大眾傳媒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文化中心」(賽倫·麥克萊，2005：6)。從這些表述中，都能夠看出媒介是如何深入並持續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發生着影響的。如果我們說這一切的發生都以「媒介」為核心，那麼，媒介在這裏發揮出來的即是一種中介化的作用。

誠然，在當今社會的各種場景中，「中介化」都是談及媒介和社會文化發展必然都要面對的問題。但是，大多數研究者並未針對十分具體的社會「場景」或「情境」來展開分析，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之下，「媒介化」或「中介化」是否會對它們產生不同的影響？產生不同影響的深層原因是甚麼？這樣，到了鄉村社會生活中，我們除了關注一般意義上媒介對人所帶來的影響之外，更要把這種關注置於鄉村社會的生活邏輯和社會脈絡之中。如長期做農村研究的賀雪峰認為，研究中國農村非均衡性的關鍵在於「理解一個農村地區的內部結構及其歷史演變，只有深入解剖村莊本身的運作和理解村莊結構，才能建立起對於理解中國農村政策實踐區域差異有益的田野經驗」(賀雪峰，2005)。

正是在這點上，「深入村莊本身的運作」和「村莊結構」成為我們面對鄉村做研究時必須要採取的視角。而在傳媒與少數民族社區研究的過程中，這還不僅僅體現為一種「視角」，還可以成為研究者採取的基本概念。或許這個基本概念的表述有所不同，但顯然很多研究者都開始意識到了它的重要性：「我們過去理解傳播，往往是孤立思維，停留在傳播學層面做自我解析，這令傳播學長久以來較少借用社會學理論。而實際上傳播作為微觀現象或中觀過程可與宏觀社會情境相扣，實現文本性(textuality)和情境域(contextuality)的結合。所以傳播不僅是傳播本身，更是社會機構和現代性的制度性維度之一，並且是極為重要的維度，可以調節其他維度乃至整個現代性的構成與轉變。」(馬傑偉、張瀟瀟，2011：109-110)放到具體的少數民族研究中，如有學

者在研究少數民族村民和手機使用時認為：「傳媒被賦予的多重意義以及人們對傳媒的使用方式、使用目的、使用後的影響等差異，並不僅僅取決於媒介的獨有特性和使用者的主體性，而且還取決於媒體使用的社會結構、文化差異等具體的語境」（孫信茹，2011）。還有學者認為傳媒與鄉村社會的研究「不僅僅是單純的媒介與個人、社區的因果關係研究，而要涉及更多的社會環境因素，需借用更多的社會學理論、概念來分析、解釋、論述」（郭建斌，2003）。

儘管表述有所不同，但這些研究視角無疑展示了研究者將鄉村社會邏輯和生存脈絡自覺地引入到了傳媒與鄉村社會的研究之中。在已有的理論成果中，不乏有對鄉村社會邏輯做出的概念性概況，如「生活慣例」（吉登斯，1998：8）、「生活方式」（王銘銘，2005：170）、「文化網絡」（杜贊奇，1996：13）等。這些概念或者強調鄉村社會生活的思想和文化基礎，或者將鄉村生活看作一種實存的方式，甚或將鄉村看作是權力運作的組織類型。對於在村落視野中研究傳媒的學者來說，這些概念給我們的啟發是極大的。可是，這些概念多從社會學或人類學的角度進行總括，無論是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內涵，還是概念所涉及的研究範疇，都有自身獨特的要求與表述。如果從傳播研究的立場出發，提出和建立適合自己學科領域內的分析概念也是很有必要的。我們可以用「日常語態」作為分析展開的一個基本概念。「日常語態」的概念意味着研究者進入到少數民族村寨和社區中，深度挖掘其生存的具體時空和運作肌理，由此，研究者更易對人們使用傳媒、認知傳媒、觀念變化、文化變遷等問題做作出清晰地回應。

具體來說，「日常語態」的概念包含了至少三種基本的意涵。一是空間上的「日常語態」。我們經常所講的進入一個鄉村，必須要對其所處的行政隸屬關係、區位、自然環境、人口、民族、村落內部結構（如家族、公共場所、村中道路等），村落外部結構（如山林、河流等）、社會、經濟等等情況做全面的調查和了解，即做空間層面「日常語態」的調查。比較起來，這類調查中的社會和經濟狀況是比較複雜的內容。如社會層面的調查就必須要了解婚姻家庭、家族、氏族、親屬制度、社會組織、社會分層、社會流動、民族關係和社會控制等；經濟層面的調查必須了解村民經濟來源、經濟產業的構成、家庭支出和消費等問題。

二是時間上的「日常語態」。村落的歷史、政治、經濟和文化從來都是歷史性存在和發展的產物。「以當代中國鄉村研究為例，以民族誌呈現個案經驗時，如果撇開對歷史的考察(哪怕是極為簡單的)，許多經驗將變得無法理解」(譚同學，2009)。所謂時間上的「日常語態」即着重將村落的發展置於社會歷史的背景之下來做了解，如村落發生的不同歷史階段的特點、變遷、社會轉型、文化要素的轉變等等。

三是文化象徵意義上的「日常語態」。村落不僅僅是當地人活動和生活的場景，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進入一個村落，理解當地節慶、人生禮儀、宗教信仰、生活習俗、民間藝術等，這些節點，往往蘊藏了民族文化主體對自我文化的經驗、知識和記憶，了解它們從而有助於我們把握村落和民族的精神內核與文化表徵。「對於一個天才的研究者來說，描述一種文化各部分之間的內在關聯並非難事，但是，他提供的模式仍然是認知性的。即使獲得了這種關聯，也不能獲得一種對該文化令人滿意的印象，我們不知道這種文化的成員是如何相互『經驗』其文化的。情感、意志與思想一樣，也構成了文化結構的一部分，即文化經驗，它既包括個體的文化經驗，更主要的是指其成員集體的經驗，這主要體現在神話、藝術、象徵與慶典當中」(王傑文，2011)。因此，對儀式和象徵性活動的觀察，不止於把握它們的基本形式，而是通過這些節點尋找到關於該社會潛藏着的、本質的意義所在。而唯有把握了這種「本質」和「意義」，也才能讓我們更深入地透析當地人如何使用媒介、如何解讀信息、如何與傳媒互動等信息。

如果說，「日常語態」把觀察視野更多放置於時間和空間交織之下的村落內部，那麼，我們說，任何一個村落和社區都不可能是個體性的獨立存在，它必然要和社會各個方面發生或多或少的互動、因此，除了把握村落內部的「日常語態」之外，注意村落和外部世界的聯繫，也成為我們進行村寨研究時要關注的面向。如弗里德曼、施堅雅等人秉承的微觀社區研究的傳統方法，儘管在特定的社區內做研究，但「必須要在空間的視野和時間的縱深上加以突破，也就是說，不但要關注村落社會的『縱向的歷史』，還要關注村落社會以外的空間」(劉朝輝，2005)。事實上，在關於村落社會的研究中，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有很多研究者開始運用「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劉朝輝，2005)。他

們的分析焦點或主線，「在於審視一個小村莊是如何同大國家聯繫起來的」（劉朝輝，2005）。

同樣，對於研究媒介化社會背景下的少數民族村寨文化來說，這種跨越村落空間的大視野顯得尤為重要。如有學者提出，要尋找到研究中國農村和其他經濟社會落後地區傳播事業發展規律的新的、有用的分析工具和分析的框架，最重要的就在於關注大眾傳播媒介存在的「社會基礎」（段京肅、段雪雯，2011）。按照這種看法，對經濟落後農村地區而言，社會基礎的顯性表現是「一種狀況、兩種素質、三種關係」的綜合指標。「一種狀況」指特定時期內農民的基本經濟生活狀況；「兩種素質」指農民的基本文化素質和科學素質；「三種關係」指「由於各種因素所促成的發生於農民之間、農民與各種社會階層之間以及農民與國家之間特定的聯接關係。」（段京肅、段雪雯，2011）這樣的觀點給我們很大的啟發。「一種狀況」、「兩種素質」和我們提到的「日常語態」有不少重疊的地方，而「三種關係」則展現出一個村落與外部國家、社會各種力量互動的動態性過程。即便是遙遠的鄉村，在國家和社會歷次的重大變化和階段性發展過程中也不能獨立於外。尤其是在媒介化社會的影響之下，這種「身處其中」之感只會變得愈加強烈和迅速。因此，我們在關注村落「日常語態」的同時，還應該把握住村落與外部世界的廣泛聯繫，尤其是國家政策、體制變動和經濟轉型等外部因素對社區生活造成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的研究要有「從村落看村外」和「從村外看村落」（劉朝輝，2005）的「超越鄉土」學術視野。

「超越鄉土」這個概念又具體化為三個層面的內涵。其一，超越鄉土的「個人」。鄉土社會向外的擴展和社會文化的轉型與改變，說到底，對於生活於其中的個體影響最大。個體在面對越來越被納入到一種共同文化的現實時，媒介重新定義着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和想像，也在重新書寫着個人存在的價值和歷史。少數民族村寨中的個體和大都市中的個人一樣，也在經歷着現代主義的無序和碎片化帶來的影響，現代性的含混與失序也會重構着鄉土社會中人們的觀念和文化。其二，超越鄉土的民族或「族群」。少數民族村寨總是由某個民族或某些族群構成的，這就必然涉及到不同族群之間觀念和異質文化的互動。媒介化社會中的少數民族村寨民眾必然也會被捲入到不同民族文化之



間的交流、融合等過程中。其三，超越鄉土的「國家」。少數民族村寨作為國家行政組織中最為基礎性的組織，其存在必然是在一國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的發展和影響之下展開的。因此，「國家」層面構成了少數民族村寨研究中最為宏觀同時又是極不能忽視的一個層面。國家政策的調整、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文化主導意識層面的變化，地方和國家存在的巨大張力，各種衝突和矛盾都會在這些具體的村寨中出現。

### 具體如何展開

建立研究的理論前提、基本概念和框架之後，接下來的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展開具體研究」？換言之，我們為何要在具體的村寨當中做研究。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最新統計數字，目前我國11,379餘萬少數民族群體佔全國總人口的8.49%，絕大部分生活於西南、西北、東北等區域的高原、山地與丘陵地帶，並集中分佈於全國各民族鄉、鎮的11,763個村民委員會之下的各村寨。<sup>4</sup>顯然，少數民族村寨是目前他們基本的生存和活動空間。傳媒對少數民族文化影響畢竟是一個宏觀和涉及面極寬泛的問題，因此，落腳在具體的「村寨」上使研究具有了實際的操作性和深入探討的可能性。

對於民族傳播研究來說，重點要探析媒介化的社會背景下，少數民族村寨生活和文化存在怎樣的日常語態、如何「超越鄉土」等問題，從而在此框架內觀察少數民族文化和現代傳媒及傳播的關聯與互動，並探討其文化變遷或轉型等問題。這樣的研究不僅需要做深入地理論探討，而且相關理論的分析和建構必須是建立在大量的實證調查的基礎上。因此，選擇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田野點展開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以我們的研究為例，在選擇田野考察點時我們考慮了以下基本條件：一，該民族的村寨文化處於急劇變遷之中；二，該村寨有現代傳媒的進入和影響；三，該村寨是典型的少數民族村寨，具有較為完整的少數民族村寨文化體系；四，能夠保證調查者調查的順利展開；五，選擇四個村寨可為後續的研究提供比較的基礎。

基於以上的條件，以我們選擇的4個雲南的少數民族村寨為例：紅河州元陽箐口哈尼族村，哈尼文化保存較為完整。該村在2000年前後

開發為元陽縣民俗旅遊文化村後，村寨受到外來文化、信息等各方面的影響較大，村寨文化正處於急劇變遷之中；怒江州蘭坪大羊普米族村，該村為全國較為集中的普米族聚居村落，經濟較為落後。但難能可貴的是，當地有一批普米青年具有較強的文化自覺意識，近年來不斷挖掘自身民族文化，其中也不乏一些積極使用手機媒體和互聯網的做法；大理州劍川石龍白族村，該村作為極富盛名的白族民間歌舞之鄉，既有傳統的白族文化，且村民善用現代傳媒；德宏州瑞麗大等喊傣族村，該村為當地聚居傣族人數最多的村寨，保留着較為完整的傣族建築和文化。該村寨旅遊開發較早，又加之村落具有跨境（村寨挨近中國和緬甸的邊境線）的特點，使得當地的文化和信息傳播呈現出和其他地方較大的差異。

這四個點都處於雲南，按照有學者的觀點：「雲南農民社區一向被人類學前輩視為『最佳文化實驗室』。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雲南『就人文組成 (human make-up) 來說，在全中國是最多樣的地區』」（朱曉陽，2003：33）。更有學者認為這種文化多樣性一定程度上是由雲南的地理造成的，「在這些偏僻的地帶即使有相類似文化背景的漢族也由於地理和經濟條件的差別而遵循相對獨立的發展途徑。……這個地區的漢族農民比中國其他地方的農民更受傳統文化制約。因此選擇研究雲南村落是了解文化變遷過程的一個好機會」（朱曉陽，2003：33）。儘管這番論述主要是針對雲南漢族社區展開的，但是，這對分析生活環境迥異、文化差異較大的雲南少數民族社區來說也是同樣適用的。當然，選擇這四個田野點，並非就是說這四個點就能囊括所有少數民族村寨的特性。但至少，這四個點分別代表了四種處於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發展階段的文化，同時，它們在現代媒介對村落造成的衝擊和形成的影響方面有着很多相似點。因此，對它們展開的個案研究，既能探析作為個體的村寨在傳媒影響之下發生的獨特而鮮活的故事，同時，又可給民族傳播研究提供相似的經驗和分析模式。

確定調查村寨之後，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成為重要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論上，它與統計分析具有對照性意義……在從特殊性到普遍性、從微觀到宏觀的分析鏈條中，個案如果要取得與統計分析相當的、甚至於更接近於普遍性和宏觀且具有說服



力的論據，就必須在經驗的質的分析方面多下功夫。正是在質性的複雜性、微妙性和歷史性方面佔優勢，個案的深入性才具有自己的獨特的長處。由是，深入調查成了增強個案研究說服力的不二法門」(譚同學，2009)。對於傳媒研究者來說，採用和格爾茨一樣的「深描」精神成為勢所必然。格爾茨正是在闡述巴厘人鬥雞遊戲的過程中，揭示巴厘社會中的關於社會秩序、男子漢氣概的炫耀性的「深層遊戲」。譬如，在筆者對蘭坪大羊普米村寨的調查中，發現村民時常有把手機當作禮物交換的做法，大約有70%的手機用戶都有互相交換手機的經歷，有的年輕人通過這種方式，短短兩三年時間，手機就可能用過20、30多個。而且，這種交換並不是隨意發生的，往往只是發生在親屬、比較要好的朋友以及關係較為親密的同輩人之間。又如，在筆者調查的德宏大等喊傣族村寨裏，照片的拍攝、收集、在客廳裏懸掛照片成了每戶家庭都有的活動。家庭照片不僅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儀式的見證者和記錄者，照片的存在，成為理解當地傣族人個體記憶、社會記憶、身份認同，以及家庭成員的自我認知等問題的重要媒介。

可見，當我們要對這些材料做進一步的闡釋時，對該社區充分和深入地了解就成了闡釋的基礎。可以說，沒有了解大羊普米族村民們依然固守着的鄉土社會交往邏輯和人情面子的基本背景，那麼，就無法說明為甚麼對於城市人來說原本屬於更多私人使用物品的手機，在這個鄉村卻能夠以如此流通和交換的方式出現。如果說普米村民們交換手機是為了互嘗新鮮的話，倒還不如說在普米村民中交換的是「關係」。我們同樣還看到，如果不是大等喊傣族人對佛教如此虔誠的信仰；如果不是綿延數公里和緬甸的一衣帶水，那麼，我們就無法理解為甚麼在傣族人的家庭照片中到處充滿了對佛的敬仰，處處都流露和邊境民族的交流交融。唯有深入到當地人的「日常語態」之中，把握當地人的生存邏輯，才能真正去理解當地人日常社會、文化生活與傳媒之間發生的互動與關聯。

和純粹人類學的研究不同，我們的切入點在於媒介和傳播，因此，把握媒介在場和村寨文化轉型之間的關聯成為我們研究的重點。具體來說，這樣的分析可以大致從三個層次入手：一是媒介和村落個體之間的互動。媒介的接觸和使用首先還是從每個獨立的個體開始，

所以，當我們進入一個村落時，發現那些村落中最早使用媒介、善於使用媒介的個人並將他們作為調查重點，就成為研究者應該首先關注的節點。二是媒介和村落公共空間生活之間的互動。而在這個過程中，去發掘鄉村社會的「日常語態」，深入剖析這些「日常語態」是如何與傳媒進行深入的互動，從而影響到村落整體社會秩序、公共活動方式等問題。例如，傳媒與村落的社會文化網絡之間的關聯、傳媒對村落公共活動（村民大會、村落集體活動等）的滲透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常語態」中把握村寨傳媒與傳播的內容時，也要求研究者對於「傳播」有新的認知和理解，尤其關注傳播也是一種「意義共享的文化」這一重新的理解。三是媒介和村落神聖空間（或文化空間）之間的互動。對於少數民族村寨文化系統來講，村落中人們的祭祀、婚姻、葬禮等活動不只是單個人或單個家庭的活動，這些活動串聯起的往往是宗族，乃至整個社區的共同性活動。而在這些神聖的儀式活動中，完整的儀式流程和活動能夠幫助研究者深入到當地的文化內核之中。而現代社會的傳媒影響，使得這種神聖空間的變化也概莫能外。

在觀察這幾個不同層次的互動之中，把握三種力量在村落中的關係也十分關鍵，即個人、民族、國家。在傳媒和傳播影響下重新書寫的少數民族村寨「畫面」中，個人的感悟和體驗大相徑庭，族群的認同和文化的力量隨時隨地發生作用，而國家作為來自外部的強勢的影響要素也無時不刻在具體的村寨中得到回應。因此，這三個層面展現出的是一個微觀—中觀—宏觀的不同分析邏輯。對這些不同層面和分析邏輯較為全面的把握，能夠讓我們對民族傳播研究的理解更加深入和立體。

### 形成怎樣的理論進路

時至今日，沒有誰能夠否認傳媒對現代社會帶來的全方位的影響。傳媒的影響，開始提醒任何一個領域的人文社會學者都必須要對它給予足夠的重視。

在這樣的基點上，民族傳播的相關研究首先提醒研究者必須要重視「媒介在場」。這種「媒介在場」，既是對當今社會，傳媒廣泛滲入到

社會各個角落這一「媒介化社會」現實的回應；同時，它也是一種做傳媒與社會研究時必須要具備的研究思路和理論視野。尤其對於後者而言，隨着研究話題討論的深入，研究者也應該注意到，「我們不要只把媒介理解為影響之源，它既不是簡單的有益，也不只是有害。我們應該把電視嵌入日常生活的多重話語中。我們需要知道，這些話語是甚麼，它們之間是怎樣互為界定的，它們是如何編織在一起，以及最關鍵的，它們是如何依據相互之間的影响而區分開來的」(西爾弗斯通，2001：2)。儘管西爾弗斯通主要分析的是電視媒介，但「多重話語」對於「媒介在場」的啟發也是極有價值的：研究者不僅要注意到媒介在具體環境中的出現和影響，當地人是如何使用和理解媒介；更要看到媒介是一種實踐活動，同時也是控制手段，特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生存環境等多元話語是媒介展開實踐活動的基本背景。「媒介在場」強調，做民族傳播的研究時首先應該將媒介還原到其存在及發揮影響作用的基本背景之中。

在摸清了媒介如何「在場」、有哪些「在場」等基本情況之後，「媒介邏輯」的引入成為我們研究時的第二個理論進路。正如前面分析過的，「媒介邏輯」強調在複雜的社會網絡運行和構成中，媒介力量和社會生活、經濟運行、文化影響等其他邏輯一樣，都同樣發揮着對整個社會系統的影響。對「媒介邏輯」的理解又可具體化為「一般性邏輯」和「特殊邏輯」。所謂「一般性邏輯」指的是媒介在特定社區發揮出的作用，如傳媒承載的信息傳遞、文化傳承、娛樂訴求等一般性影響。「特殊邏輯」指向的是媒介在特定時空中的獨特呈現以及不同文化系統中的人們是如何創造性地理解和使用傳媒的問題。如手機在一些少數民族社區中成為禮物交換的重要載體，電視在某些社區成為權威的象徵，現代傳媒如何成為少數民族村民們展現和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手段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特殊邏輯」提醒我們在以少數民族社區做傳播研究的對象時，鄉村自有的生活秩序和文化精神也使得我們對傳播要有重新的理解。如果將傳播看作一個意義共享的過程和象徵互動的系統的話，傳播之於這些鄉村來說，也早已是「古已有之」和已然存在的現實。尤其是當人類學進入傳播研究後，較為關注這樣一些問題：少數民族社區中傳統傳播方式和手段的運用、社區中社會關係網絡的構

成；媒介和使用者日常生活之間的權力結構，如不同的人是如何使用媒介的；這些媒介又是如何植根於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之中；傳媒使用者如何在媒介的使用過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等問題。這些研究視角都為傳媒和日常生活的互動及關聯提供了富有價值的分析成果。而無論傳播學的觀察，還是人類學的視野，隨着對媒介介入社會及日常生活分析的不斷深入，在研究上的一個共同點就是越來越多地關注傳媒使用的具體語境，即媒介使用者所處的社會結構、文化背景等。事實上，傳媒被賦予的多重意義以及人們對傳媒的使用方式、使用目的、使用後的影響等差異，並不僅僅取決於媒介的獨有特性和使用者的主體性，而且還取決於媒體使用的社會結構、文化差異等具體的語境。「我們想要細緻研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利用媒體，更需要了解利用媒體時的不同語境的複雜性及其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2000：246）。正如人類學家指出的：任何媒體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被使用，而是在劇院、客廳、茶坊、地鐵中消費的，不同的地點通過不同使用者的消費經驗的反作用會影響着媒體的含義（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2000：246）。這裏的不同「地點」或許可以等同於「語境」。這種對「語境」的關注，大致可以等同於「媒介邏輯」的強調，它突出的不僅僅是媒介使用者的時空差異，更是媒介使用者所處的不同的社會環境、經濟狀況、文化差異以及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媒介使用者所存在和形成的某些「關係」。

從「媒介在場」到「媒介邏輯」，形成了媒介化社會背景中研究民族傳播的一種可能性進路，然而，僅僅做到這兩個層面還不足以對傳媒與少數民族社區、民族文化的關聯做出更為清晰地闡釋。對少數民族村寨中傳播活動的展現，不應該止步於提供奇異和迥異於主流文化的那些故事和敘說，理論的分析更應該上升到對這些現象背後的意義、生成的背景和原因等層面的剖析上。我們可以將這一層面的分析認為是「媒介意義」。從目前的研究成果和狀況來說，要達到這個層面的分析較為困難，不少研究也止步於前兩個層面的探究上。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媒介意義」的挖掘和深度剖此顯得尤為艱難卻異常重要。

如果結合具體的少數民族社區來看，少數民族村寨和社區有着共同的一些基本特質，如自然聚居，強調血緣和地緣的群體聯合，換言

之，它們有着特定的自然、社會和文化邊界，而且社會和經濟體系也相對自足與整體性。民族傳播研究的視野下去探析少數民族村落社會文化的轉型和變遷，意味着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下，邊緣性的社會類型被主導性的社會類型所裹挾、吸納和融合的現象。村寨文化轉型，是社會一體化在社會文化領域的具體展開和反映，在這個過程中，存在不同力量的衝突、不同利益的交織和不同地位的差異。媒介化社會中的少數民族村寨文化轉型研究，其目的正在於揭示這些「關係」和不同「力量」是如何相互聯繫和發揮作用的，這當成為「媒介意義」探究中的應有之意。

而從更為廣闊的研究視角和理論意義來看，「媒介意義」的挖掘和分析價值在於：不論從傳媒與民族文化的關聯展開爬梳，還是從具體的少數民族社區落腳分析，可以肯定的就是：傳播網絡和現代傳媒是少數民族社會文化形成與轉型變遷的重要因素和影響力量。尤其是在今天傳媒影響日益廣泛的媒介化社會中，大眾傳媒作為一種強勢傳播的力量，更將少數民族村落席捲進入其中。大眾傳媒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少數民族村寨文化，或者影響着少數民族村寨文化的走向，甚或創造和建構新的少數民族村寨文化。因此，將少數民族村落的研究置於媒介化社會這一背景下，會對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一種較為新穎的觀察視角，同時，也可以為少數民族村寨文化轉型及建構提供一條極有現實價值的分析路徑。

## 註釋

- 1 數據來源於《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2012/indexch.htm>。
- 2 數據來源於《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2012/indexch.htm>。
- 3 數據來源於CNNIC第30次統計數據，<http://tech.163.com/special/cnnic30/>。
- 4 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



## 參考文獻

-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2000)。《人類學的趨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Zhongguo shehui kexue zazhishi (2000). *Renleixue de qushi*.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王傑文(2011)。〈「在場」與「生成」——反思「實驗民族誌」〉。《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頁49-55。
- Wang Jiewen (2011). “Zaichang” yu “shengcheng” —fansi “shiyen minzuzhi”. *Zhongguo nongye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3, 49–55.
- 王銘銘(2005)。《西方人類學思潮十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Wang Mingming (2005). *Xifang renleixue sichao shi jiang*.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尼爾·波斯曼(2007)。《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Neil Postman (2007). *Jishu longduan—wenhua xiang jishu touxiang* (He Daokuan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吉登斯(1998)。《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大綱》(李康等譯)。北京：三聯書店。
- Anthony Giddens (1998). *Shehui de goucheng: Jiegouhua lilun dagang* (Li Kang et al., Trans.).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朱曉陽(2003)。《罪過與懲罰——小村故事1931-1997》。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Zhu Xiaoyang (2003). *Zuiguo yu chengfa—xiaocun gushi 1931-1997*. Tianjin: Tianjin guji chubanshe.
- 吳飛(2007)。〈社會傳播網絡分析——傳播學研究的新徑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哲社版》，第4期，頁34-41。
- Wu Fei (2007). *Shehui chuanbo wangluo fenxi—chuanboxue yanjiu de xin jinglu*. *Zhongguo renmin daxuebao zheshe ban*, 4, 34–41.
- 杜贊奇(1996)：《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Du Zanqi (1996). *Wenhua, quanli yu guojia—1900-1942 nian de huabei nongcun* (Wang Fuming Tran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姚君喜(2005)。《甘肅大眾傳播與社會發展報告》。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
- Yao Junxi (2005). *Gansu dazhong chuanbo yu shehui fazhan baogao*. Lanzhou: Gansu minzu chubanshe.
- 查爾斯·霍頓·庫利(1999)。《社會過程》(洪小良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 Charles Horton Cooley (1999). *Shehui guocheng* (Hong Xiaoliang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 段京肅、段雪雯(2011)。〈經濟社會發展落後地區大眾傳播媒介發展的社會基礎——基於全方位視野分析的框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129-134。
- Duan Jingsu, Duan Xuewen (2011). Jingji shehui fazhan luohou diqu dazhong chuanbo meijie fazhan de shehui jichu—jiyu quan fangwei shiye fenxi de kuangjia. *Xinan minzu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ban)*, 1, 129-134.
- 孫少晶(2011)。〈媒介化社會：概念解析、理論發展和研究議題〉。童兵(編)《媒介化社會與當代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Sun Shaojing (2011). Meijiehua shehui: Gainian jiexi, lilun fazhan he yanjiu yiti. In Tongbing (Ed.). *Meijiehua shehui yu dangdai zhongguo*.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孫信茹(2011)。〈哈尼族村寨手機使用的傳播人類學考察〉。《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8期，頁193-212。
- Sun Xinru (2011). Hanizu cunzhai shouji shiyong de chuanbo renleixue kaocha.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18, 193-212.
- 馬傑偉、張瀟瀟(2011)。《媒體現代——傳播學與社會學的對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Ma Jiewei, Zhang Xiaoxiao (2011). *Meiti xiandai—Chuanboxue yu shehuixue de duihua*.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張宇丹(2000)。《傳播與民族發展——雲南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關係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
- Zhang Yudan (2000). *Chuanbo yu minzu fazhan—Yunnan shaoshu minzu diqu xinxi chuanbo yu shehui fazhan guanxi yanjiu*.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 張國良(編)《中國傳播學評論》(第一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Zhang Guoliang (Ed.). *Zhongguo chuanboxue pinglun* (Vols. 1.).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張瑞倩(2009)。〈電視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修補」——以青海「長江源村」藏族生態移民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期，頁38-46。
- Zhang Ruiqian (2009). Dianshi dui shaoshu minzui chuantong wenhua de “xiubu”—yi Qinghai “Changjiangyuan cun” zangzu shengtai yimin weili.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 38-46.
- 郭建斌(2003)。〈傳媒與鄉村社會：中國大陸20年研究的回顧、評價與思考〉。《現代傳播》，第3期，頁44-47。



- Guo Jianbin (2003). Chuanmei yu xiangcun shehui: Zhongguo dalu 20 nian yanjiu de huigu, pingjia yu sikao. *Xiandai chuanbo*, 3, 44–47.
- 郭建斌 (2005)。〈電視、象徵資本及其在一個特定社區中的實踐：獨鄉個案之田野研究〉。《中國傳播學評論》(第一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Guo Jianbin (2005). Dianshi, xiangzhengziben jiqi zai yige teding shequ zhong de shijian: Duxiang ge'an zhi tianye yanjiu. *Zhongguo chuanboxue pinglun* (Vols. 1).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陳慶德、潘盛之、覃雪梅 (2004)。〈中國民族村寨經濟轉型的特徵與動力〉。《民族研究》，第4期，頁28-37。
- Chen Qingde, Pan Shengzhi, & Tan Xuemei (2004). Zhongguo minzu cunzhai jingji zhuanxing de tezheng yu dongle. *Minzu yanjiu*, 4, 28–37.
- 麥克爾·赫茲菲爾德 (2005)。《甚麼是人類常識——社會和文化領域中的人類學理論實踐》(劉珩、石毅、李昌銀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 Michael Herzfeld (2005). *Shenme shi renlei changshi—shehui he wenhua lingyu zhong de renleixue lilun shijian* (Liu Hang, Shi Yi, & Li Changyin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 賀雪峰 (2005)。〈中國農村研究的主位視角〉。《開放時代》，第2期，頁86–95。
- He Xuefeng (2005). Zhongguo nongcun yanjiu de zhuwei shijiao. *Kaifang shidai*, 2, 86–95.
- 黃成炬 (2007)。〈媒介社會學〉。魯曙明 (編)，《傳播學》(頁64–6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Huang Chengju (2007). *Meijie shehuixue*. Lu Shuming (Ed.). *Chuanboxue*.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劉朝輝 (2005)。〈村落社會研究與民族誌方法〉。《民族研究》，第3期，頁94–102。
- Liu Zhaohui (2005). Cunluo shehui yanjiu yu minzuzhi fangfa. *Minzu yanjiu*, 3, 94–102.
- 劉朝輝 (2005)。《超越鄉土社會：一個僑鄉村落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結構》。北京：民族出版社。
- Liu Zhaohui (2005). *Chaoyue xiangtu shehui: Yige qiaoxiang cunluo de lishi wenhua yu shehui jiegou*.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鄭宇 (2011)。〈中國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的結構轉型與社會約束〉。《民族研究》，第5期，頁23–32。
- Zheng Yu (2011). Zhongguo shaoshu minzu cunzhai jingji de jiegou zhuanxing yu shehui yueshu. *Minzu yanjiu*, 5, 23–3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0期(2014)

- 賽倫·麥克萊(2005)。《傳媒社會學》(曾靜平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Ciaran McCullagh (2005). *Chuanmei shehuixue* (Zeng Jingping Trans.). Beijing: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chubanshe.
- 羅永常(2006)。〈文化經濟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旅遊開發〉。《思想戰線》，第4期，頁96–101。
- Luo Yongchang (2006). Wenhua jingji Beijing xia de minzu cunzhai lvyou kaifa. *Sixiang zhanxian*, 4, 96–101.
- 羅傑·西爾弗斯通(2001)。《電視與日常生活》(陶慶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Roger Silverstone (2001). *Dianshi yu richang shenghuo* (Tao Qingmei Tran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譚同學(2009)。〈類型比較視野下的深度個案與中國經驗表述——以鄉村研究中的民族誌書寫為例〉。《開放時代》，第8期，頁102–112。
- Tan Tongxue (2009). Leixing bijiao shiye xia de shendu ge'an yu zhongguo jingyan biaoshu – Yi xiangcun yanjiu zhong de minzu zhi shuxie weili. *Kaifang shidai*, 8, 102–112.
- 譚華(2007)。〈大眾傳播與少數民族社區的文化建構——對現代媒介影響下的村落變遷的反思〉。《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107–116。
- Tan Hua (2007). Dazhong chuanbo yu shaoshu minzu shequ de wenhua jiangou— dui xiandai meijie yingxiang xia de cunluo bianqian de fansi. *Hubei minzu xueyu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ban)*, 1, 107–116.

## 本文引用格式

- 孫信茹、楊星星(2014)。〈經驗表述與理論探尋——民族傳播研究的可能性路徑〉。《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0期，頁133–156。